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106-116.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7efmad>



## 节俭的伦理学与情感的货币化

### ——《理智与情感》中经济叙事的双重道德机制

张鑫 (Zhang Xin)

**摘要：**“新经济批评”为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的经济叙事与道德主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方法论框架。小说通过“饥荒价格”的历史嵌入、财产继承法的制度分析及女性经济依附性的多重再现，建构独特的“道德经济学”。埃莉诺的“审慎理性”与玛丽安的“情感过量”构成经济—道德连续体的正面张力，威洛比的“投机性情感”与露西的“算计性婚姻”则暴露市场逻辑对人际关系的渗透。奥斯丁既承认经济理性的决定作用，又坚持道德判断的相对自主性，从而形成批判性的经济人文主义。这一立场回应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命题，亦预示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核心焦虑：经济合理化与伦理价值领域的持久张力。

**关键词：**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经济叙事；道德哲学；新经济批评

**作者简介：**张鑫，博士，教授，现任职于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电邮：zhangxin@jsut.edu.cn

**Title:** The Ethics of Frugality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Affection: The Dual Mor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Narrative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Abstract:** New economic criticism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narrative and moral themes in Jane Austen's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rough historical embedding of “famine price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law, an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economic dependency, the novel constructs a distinctive “moral economics”. Elinor’s “prudent rationality” and Marianne’s “excessive sensibility” constitute the positive tension of an economic-moral continuum, while Willoughby’s “speculative affection” and Lucy’s “calculative marriage” expose the penetration of market logic into human relations. Austen acknowledges the determining function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while insisting on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moral judgment, forming a critical economic humanism. This stance responds to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Adam Smith’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anticipates the central anxiety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t fiction regarding capitalist modernity: the persistent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domain of ethical value.

**Keywords:** Jane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Economic Narrative; Moral Philosophy; New Economic Criticism

**Author Biography:** Zhang Xin is a PhD an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 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angxin@jsut.edu.cn.

### 引言：经济叙事作为文学方法论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其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始终是历史进程中的核心议题。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新经济批评”的兴起，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日益突破传统反映论范式，转而关注文学如何通过经济叙事想象和建构尚未存在的社会条件，并在这一过程中介入伦理价值的形塑（Woodmansee & Osteen, 2005, pp. 3–4）。具体而言，新经济批评将经济话语——如价值、交换、债务、投机、信用——视为一种深刻影响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符号系统和修辞策略。它不再将经济视为外在于文本的“背景”，而是将其视为渗透于文本内部、塑造人物主体性、驱动情节发展并构建道德框架的核心力量。这种批评范式认为，文学文本不仅再现经济活动，更主动参与了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理性的伦理辩护或批判，从而成为一个协商、测试乃至重塑经济观念的文化场域（Gagnier, 2000, p. 15）。马克·谢尔（Marc Shell）的货币符号学理论指出，金钱与语言共享“转义交换”的本质，“隐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济的”（Shell, 1978, p. 2）；而玛瑞吉·加利尔（Regenia Gagnier）则强调，19 世纪的英国文学经济批评应关注“经济如何被叙述，以及叙述如何经济化”（Gagnier, 2000, p. 30）。

经济叙事绝非文学文本中的背景性存在，而是情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审视社会规范、探索复杂人性的关键场域。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对金钱伦理的辩证思考，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命题，18 至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见证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学创作的深度交融（Smith, 2002; Marx, 1970）。简·奥斯丁的创作正处于这一思想交汇的历史节点：其小说既是对摄政时期英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敏锐

观察，亦构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文学性回应与反思。正如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所言，奥斯丁的小说“使经济关系变得可见，并将其作为社会分析的核心范畴”（Thompson, 1988, p. 12）。

《理智与情感》（1811）作为奥斯丁首部出版的小说，其创作历程本身即是一部经济-文本互动的微观史。该作品“至少酝酿了 15 年”：1795 年以书信体《埃莉诺与玛丽安》（*Elinor and Marianne*）初成，1797 年改写为第三人称叙事，1809-1810 年间最终修订，1810 年冬被出版商埃杰顿接受，1811 年 10 月 30 日正式出版（Copeland, 2006, p. xxiii）。这一漫长的创作周期恰逢英国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英法战争（1793-1815）的持续消耗、1795 年“饥荒价格”（famine prices）危机的爆发、农业萧条与商业衰退的叠加效应，以及斯皮纳姆兰（Speenhamland）户外救济制度的实施。奥斯丁将这一宏观历史语境转化为具体的家庭叙事，使《理智与情感》成为“理解摄政时期经济焦虑的关键文本”（Easton, 1998, p. 467）。

本文立足这一学术脉络，以“经济叙事”为方法论视角，系统探究经典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经济生活、表达时代焦虑，并由此透射深层道德主题。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理智与情感》通过双重经济叙事机制“节俭的伦理学”与“情感的货币化”，建构了一套独特的道德诗学。前者体现为埃莉诺的审慎理性、达什伍德太太的人际忠诚，以及布兰登上校的长期主义投资；后者则表现为威洛比的情感投机、露西·斯蒂尔的婚姻算计，以及约翰·达什伍德夫妇的即时性消费。这两种机制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叙事进程中相互渗透、辩证转化，最终指向奥斯丁对“经济人”假设的文学性批判。

### “饥荒价格”的历史语境与叙事嵌入

奥斯丁的经济叙事绝非抽象的观念演绎，而是深植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文学建构。《理智与情感》的创作周期（1795-1811 年）恰逢英国社会最为剧烈的经济转型期，1795 年“饥荒价格”危机、农业萧条与商业衰退的叠加效应，为小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土壤。将这一宏观语境转化为家庭叙事的微观形态，需要考察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特定历史危机在文本中的痕迹化处理、财产继承法作为制度性框架的叙事功能，以及奥斯丁个人经济经验与创作实践的互文关系。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小说经济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理智与情感》的经济叙事首先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时间性。小说开篇即呈现诺兰庄园的财产继承危机：“诺兰庄园的老主人……终身未娶，……把家产传给侄子的同时，附加了种种条件：遗嘱规定必须完整地传给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儿子，一个四岁的孩子”（Austen, 1811/2010, p. 2）。这一继承困境并非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是 18 世纪英国限定继承权制度的精确反映。更具历史纵深的是，奥斯丁将这一家庭危机置于 1795 年“饥荒价格”的宏观经济背景中，使私人领域的道德戏剧与公共领域的经济灾难形成结构性呼应。

1795 年的英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前一年夏天的严重干旱与极寒冬季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歉收，春季的非自然霜冻使麦田几近绝收（Burke, 2003, p. 271）。自 1750 年至 1798 年，英国消费品价格增长率从 50% 飙升至 100%，而工资增幅仅约 25%（Burnett, 1969, p. 137）。女小说家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在 1794 年 1 月的信中写道：“日常生活

所必需的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在增长”（转引自 Copeland, 1995, p. 15）。诗人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 (Dorothy Wordsworth) 则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邻居的观察：“短期内全国就只剩两种人了：最有钱的人和最贫穷的人” (Wordsworth, 2002, p. 3)。这种经济极化现象直接渗透进《理智与情感》的人物塑造：达什伍德太太与女儿们的年收入仅五百英镑，而格雷小姐的嫁妆高达五万英镑，威洛比的年收入约六七百英镑却“花销大，……总是年年债上加债” (Austen, 1811/2010, p. 314)。

奥斯丁对经济细节的精确控制体现了“新经济批评”所强调的“想象经济学”特征。当埃莉诺和玛丽安讨论婚姻的经济门槛时，玛丽安“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说：‘但愿有什么人给我们每人一大笔钱就好了’”，这一“幻想的幸福使她激动得眼睛闪闪发亮，高兴得双颊绯红” (Austen, 1811/2010, p. 91)。这一场景绝非简单的浪漫主义插曲，而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戏剧化呈现：即使是一次依靠经济实力而获得的幸福的空幻想象，也能使年轻女性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玛丽安随后提出的生活标准——“大约一千八百或者两千镑一年”——在当时的经济语境中具有明确的阶级指涉：年收入一千英镑的家庭方能“雇得起三个女仆，一个男仆，一个马车夫，买得起一辆两轮敞篷马车或四轮大马车和几匹马” (Nottingham, 2014, p. 102)。

《理智与情感》的核心经济叙事围绕财产继承法展开，这一法律制度构成了小说道德戏剧的制度性基础。老庄主的遗嘱规定：“一份限定了继承权的不动产既不能变卖也不能用作抵押，……只有两代之内的财产才能被限定继承权” (Austen, 1811/2010, p. 2)。这种复合继承制——不动产的长子继承与动产的分割继承——直接导致达什伍德太太与三个女儿的经济边缘化。她们“除了先父留下的少量政府债券的微薄利息”，别无其他收入来源，被迫“在自己的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Austen, 1811/2010, p. 2)。

奥斯丁对这一法律制度的批判并非直白的政治抗议，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对比性安排实现的。约翰·达什伍德继承诺兰庄园后，其妻子以十三篇演说的“经济理性”说服丈夫将承诺给妹妹们的一千镑缩减为“替她们留心找所舒适的小房子呀，帮她们搬搬东西呀，等鱼和野味之类上市的时候，送她们一些呀” (Austen, 1811/2010, p. 10)。这一情节揭示了经济叙事的核心道德悖论：在“饥荒价格”的危机语境中，中产阶级女性的“主动美德”——行为指南所倡导的慈善与济贫——被经济利益完全吞噬。范妮的道德败坏并非个人品性缺陷，而是财产继承法所结构化的性别—阶级位置的产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洛比的经济叙事轨迹。这位“具有开朗、可爱而活泼的风度”的青年绅士，因“家产原就不大，……总是大手大脚花钱，总跟比我富有的人混在一起”，最终选择“娶个有钱姑娘，重立家业” (Austen, 1811/2010, p. 314)。他的婚姻决策完全遵循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玛丽安的微薄财产与格雷小姐的五万英镑嫁妆构成清晰的成本—收益计算。然而，奥斯丁的叙事策略使这一“理性”选择暴露出深刻的道德危机，威洛比的“自利”与斯密《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形成辛辣的对照，其个人效用最大化导向的是他人的情感毁灭与自我的道德贬损。

奥斯丁在《理智与情感》创作与出版过程中涉及的经济考量本身即构成了文本的元经济叙事。她曾告诉姐姐卡桑德拉关于校对和修改的情况，尤其提到收入和稿酬：“这部小说的

收入依然与往常一样，但如果我能的话，我将要求提高稿酬”（Austen-Leigh & Austen-Leigh, 1913, p. 196）。这种对金钱锱铢必较的态度与小说中对经济细节的精确刻画形成互文。1796年1月，她记述哥哥亨利“购买牛津郡副官职位的计划现在已经破灭”，她们“整理并分发了妈妈做的旧帽子”；两年后，家中的马匹也没有了，父亲“把一只莱斯特郡羊上个星期卖给了屠夫”（Austen-Leigh & Austen-Leigh, 1913, pp. 76, 88）。

这些私人经济叙事与小说中的“节俭美学”形成深层关联。1798年10月，奥斯丁在斯蒂文顿的“里德斯夫人”商店购物后，写信给卡桑德拉：“我买了一些日本颜料，下周就可以开始拾掇我的帽子了，这可是维系我主要乐趣之所在的东西了”（Austen-Leigh & Austen-Leigh, 1913, p. 87）。伊恩·里奇（Ian Rich）指出，“旧衣翻新、帽子染色等做法不仅可以使她有焕然一新的外貌，……还可以为她在舞会上赢得更多的赞赏”（Rich, 1998, p. 57）。这种在物质匮乏中维持审美追求与社会参与的节俭伦理学，不仅是埃莉诺经济-道德策略的生活原型，更构成了小说“道德经济学”的隐性纲领，它将在人物命运的展开中，与另一种将情感彻底市场化的逻辑形成尖锐对照。

### “节俭的伦理学”：审慎理性与长期主义

面对“饥荒价格”危机与财产继承法的双重挤压，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发展出差异化的生存策略，形成一套可称之为“节俭的伦理学”的道德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单一的道德教条，而是在经济约束条件下维护伦理自主性的多重路径：埃莉诺以“审慎理性”实现情感与经济的动态平衡，达什伍德太太以“反经济”的人际忠诚对抗市场逻辑，布兰登上校则以“长期主义”的投资理性跨越即时性消费主义的陷阱。三者共同构成了“道德经济学”的完整光谱，既相互补充又彼此张力，折射出摄政时期中产阶级女性在公私领域间的复杂处境。

埃莉诺·达什伍德构成了《理智与情感》中“节俭的伦理学”的核心载体。与传统批评将其视为“理智”的抽象化身不同，本文认为埃莉诺的主体性建构体现了一种“道德经济学”的实践策略，那是一种在极端经济依附条件下维护伦理自主性的女性经验。这一策略首先表现为情感表达的“成本-收益”管理：当得知爱德华与露西·斯蒂尔的秘密婚约时，埃莉诺选择“下定决心要按照每一条荣誉和诚实原则行事”，同时“利用任何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保护母亲和妹妹免受信息冲击（Austen, 1811/2010, pp. 138-139）。

这种隐忍并非情感压抑，而是亚当·斯密所谓“合宜性”的女性化实践。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公正的旁观者”的内在化使个体能够调节自我情感以符合社会规范（Smith, 2002, pp. 109-113）。埃莉诺的“合宜性”实践具有明确的经济维度：她对爱德华的爱情宣言，“我一向收入少，习惯了，为了他我什么穷日子都能熬”，将情感承诺与长期经济承受力绑定，拒绝了露西式的机会主义计算（Austen, 1811/2010, p. 144）。这种“道德货币化”策略使埃莉诺在婚姻市场中最终获得“超出预期”的回报：德拉福牧师住宅、二百五十镑年收入，以及“选用墙纸，安排灌木林，开辟一条曲径”的审美自主权（Austen, 1811/2010, p. 368）。

与埃莉诺的审慎理性形成对照的是达什伍德太太的“反经济”人际伦理。作为财产继

承法的直接受害者，她拒绝将经济地位作为待人接物的首要标准。当讨论埃莉诺与爱德华的关系时，她明确表示：“贫富悬殊就得拆散一对情意相投的情侣，她压根儿就反对”（Austen, 1811/2010, p. 14）。这一立场与当时的行为指南形成张力，因为后者强调女性应通过“谦卑、服从和忠诚”去维护家庭经济利益（Gregory, 1996, p. 45）。

达什伍德太太的伦理观念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她保护女儿们免受约翰夫妇的经济剥削，同时拒绝露西·斯蒂尔式的算计性社交。这种“高贵的责任”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语境中可被理解为“通过实践发挥自己的道德判断力来修正一般道德规则”（Wollstonecraft, 1992, p. 305）。然而，奥斯丁的叙事并未将这一伦理理想化：达什伍德太太的“情感”导向同样导致判断失误她对威洛比的最初认可、对布兰登上校的“老得不该结婚”的偏见，都显示了“反经济”伦理的认知局限。

布兰登上校的经济叙事体现了第三种“节俭的伦理学”形态：“长期主义”的投资理性。他的两千镑年收入、德拉福庄园的产业管理，以及对玛丽安的持久情感投入，构成了一种跨越市场波动的价值投资策略。与威洛比的即时消费主义不同，布兰登上校“两年前”即认定玛丽安的价值，尽管当时她“认为他是位老得不该结婚的人，而且还得穿法兰绒背心保护身体”（Austen, 1811/2010, p. 372）。

这一“长期投资”的道德回报在小说结局中得到实现：玛丽安“开始担负起新的职责，被安置在一个新的家里，当了妻子，成为一位家庭主妇，而且还是一个村落的女庇护人”（Austen, 1811/2010, p. 372）。然而，奥斯丁的叙事对这一“幸福结局”保持着批判性距离，玛丽安的转变被描述为“在大家一致同意之下，就必得成为报偿这一切的人”，其情感自主性的丧失与阶级地位的跃升形成代价关系。这种“道德-经济”的辩证，使《理智与情感》超越了简单的劝诫小说模式，成为对“改良”意识形态的复杂反思。

### “情感的货币化”：市场逻辑与道德危机

然而，“节俭的伦理学”并非小说经济叙事的全部。奥斯丁同样以惊人的洞察力，呈现了摄政时期市场逻辑向情感领域的全面渗透，一种可称之为“情感的货币化”的道德危机形态。当市场逻辑渗透进情感领域，人际关系便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投机的资本形态。这一批判性维度同样呈现为三种典型形态：威洛比的“情感投机”将浪漫追求转化为高风险杠杆操作，露西·斯蒂尔的“婚姻套利”利用信息不对称实现利益最大化，约翰·达什伍德夫妇的“消费主义”则将新获财富转化为即时性炫耀与义务规避。这三类人物构成了“道德经济学”的负面教材，其叙事功能不仅在于道德贬斥，更在于揭示经济理性自我瓦解的内在悖论——当一切情感都被标价，市场逻辑本身亦丧失合法性基础。

威洛比构成了《理智与情感》中最具经济-道德张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情感轨迹从玛丽安的“浪漫英雄”到格雷小姐的“财富猎手”，可被解读为一种“情感投机”的完整周期。威洛比对玛丽安的初始追求遵循“高杠杆”策略：以有限的个人魅力获取最大化的情感回报，同时保持“投资组合”的多样性。

这种投机策略的破产源于现金流危机。威洛比坦陈：“我要的是她的钱，我那样的处境需要我不管怎样都不能闹翻脸”（Austen, 1811/2010, p. 323）。这里的“处境”具有精确的经

济指涉：年入六七百镑的开支赤字、史密斯太太遗产的不确定性，以及“年年债上加债”的复利效应。格雷小姐的五万英镑嫁妆构成了威洛比的“并购”目标，这一横向整合使其债务结构得以重组，但代价是道德信用的彻底破产。

奥斯丁对威洛比的叙事处理体现了“新经济批评”所关注的“经济主体性”问题。威洛比的自我辩解：“我早已盘算着该娶个有钱姑娘，重立家业了” (Austen, 1811/2010, p. 314)，将婚姻市场理性化，但其“盘算”暴露的是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伦理空洞。与埃莉诺的“道德经济学”不同，威洛比的计算排除了公正的旁观者的调节机制，导致情感与道德的完全工具化。

露西·斯蒂尔代表了“情感的货币化”的另一种形态“婚姻套利”。她的经济策略基于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时机把握：与爱德华的秘密婚约使其获得“期权”地位，而费勒斯太太的继承权变更则触发“行权”决策，使之从爱德华转向罗伯特。这一操作的效率令人侧目：露西“迅速地放弃爱德华转而选择其弟”，并以“爱德华对爱情不专一”为借口解除前约，完全“出于经济利益考量” (Austen, 1811/2010, p. 367)。

露西的精明具有性别化的经济维度。作为“出身低微”、年近三十的女性，她面临的是“剩女”市场的极端竞争压力。她的策略选择是对行为指南所教导的女性“主动美德”的讽刺性转化：将慈善济贫的伦理转化为社交攀附的技术。奥斯丁对露西的刻画保持着复杂的道德态度：一方面，她的“毫不文雅，做事不正派，心地不正直”受到明确谴责 (Austen, 1811/2010, p. 127)；另一方面，其“懂得怎样充分利用一切”的居家管理能力获得隐性认可，“她如果和爱德华结婚，即使‘费勒斯太太只给她儿子五百镑一年，她也会跟有八百镑的人一样过得体体面面的’” (Austen, 1811/2010, p. 251)。

这种道德模糊性体现了奥斯丁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性反思。奥斯丁“对于那些因缺乏财富而‘贬值’的女孩大多持同情态度”，露西的“工于心计”背后难掩“境遇之艰辛与生存之不易” (Su, 2017, p. 78)。露西作为“最高明而稳妥的野心家”，“满嘴情意，几乎不提钱字，谋求财富的目的深藏在符合通行道德观念的语言和行动之下” (Huang, 2010, pp. 175–192)。

约翰·达什伍德夫妇代表了“情感的货币化”的第三种形态——即时性消费主义。他们的经济叙事以诺兰庄园的继承为起点，以“鱼、野味和偶尔的帮助”的承诺缩减为标志，体现了新获得财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倾向。达什伍德夫人的十三篇演说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家庭经济学”话语：将父亲的临终嘱托重新定义为“不合理的”义务，将妹妹们的经济需求转化为依赖的道德风险。

这一话语策略的成功在于其对“大方” (liberal) 概念的操纵。约翰最初希望“能够大方一下子的”，使举动“又大方，有体面” (Austen, 1811/2010, p. 4)。这里的“liberal”兼具经济慷慨与政治开明的双重含义，但在范妮的修辞运作中，这一概念被缩减为“鱼和野味”的象征性交换。尼古拉·斯利斯 (Nicola Sleath) 指出，奥斯丁“不失时机地将自己对礼仪道德的要求灌输其中”，同时暴露了“conduct”话语的经济本质 (Sleath, 1988, p. 73)。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夫妇对“改善”的投资。约翰计划将诺兰公地圈起来，购买“东金汉农场”，却因“股票大跌”而犹豫 (Austen, 1811/2010, p. 219)。这一情节揭示了摄

政时期土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危机：农业“改良”的收益预期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形成张力。约翰的经济焦虑——“如果不是我银行里存款够用，我就得卖出股票，大大亏本的”（Austen, 1811/2010, p. 219），将小说的时间性锚定于 1795–1811 年的金融动荡期，使私人叙事与宏观经济形成索引关系。

### 道德诗学的经济-伦理辩证

“节俭的伦理学”与“情感的货币化”作为辩证的两极，其张力并非简单的善恶对峙，而是揭示了现代性条件下经济理性与伦理价值之间的深层悖论。小说最终的道德诗学，正是在这一悖论中寻求有限度的综合。这一诗学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在承认经济理性结构性力量的同时，为道德判断保留相对自主的空间？奥斯丁的解决方案并非简单的二元调和，而是通过“理智”与“情感”的再概念化、“无私利他”的礼仪重构，以及一种可称之为“批判性的经济人文主义”的立场，实现经济-伦理辩证的文学性超越。以下三个层面的分析将揭示这一道德诗学的操作机制及其历史限度。

传统批评将《理智与情感》解读为“理智”对“情感”的胜利，或两种品质的最终调和。基于真实时代背景的经济叙事分析可以发现，“理智”与“情感”其实呈现出一种概念化对立的局面：埃莉诺的“理智”实质是“道德经济学”的实践理性，而玛丽安的“情感”则是对商品化人际关系的审美抵抗。这一解读与克劳迪娅·约翰逊（Claudia Johnson）的修正主义观点形成对话，后者指出“‘感性’这个基本术语在这部小说中只是偶尔出现，而且有点残缺不全”，真正核心的是“不确定性和道德上的希望”（Johnson, 1983, pp. 171–172）。

玛丽安的经济-道德轨迹体现了“情感过量”的代价与转化。她对威洛比的“一见倾心”拒绝了婚姻市场的信息筛选机制，其“设置帽子征服男人”的厌恶（Austen, 1811/2010, p. 43）是对露西式算计的反向极端。然而，威洛比的背叛迫使玛丽安接受“情感教育”：从“想象支配现实”到“理智调节情感”的转变，并非简单的道德驯化，而是对经济约束条件的认知适应。她与布兰登上校的婚姻，希望“在大家一致同意之下，就必得成为报偿这一切的人”的理想（Austen, 1811/2010, p. 372），既是阶级跃升的经济理性选择，也是情感自主性的结构性丧失。这种“道德-经济”的悖论，使玛丽安的结局成为奥斯丁最复杂的叙事设计之一。

《理智与情感》的经济叙事最终指向一套重构的礼仪伦理。这一伦理既非纯粹的功利计算，也非浪漫的情感至上，而是在经济约束条件下寻求“合宜性”的社会实践。埃莉诺对露西的“隐忍”、达什伍德太太对约翰夫妇的宽容、以及布兰登上校对威洛比的隐性宽恕，都体现了这一伦理的操作特征。

奥斯丁的叙事策略使“无私利他”成为经济理性的超越性维度。埃莉诺保护母亲和妹妹的情感劳动、达什伍德太太打破门第观念的婚姻支持、以及布兰登上校对德拉福教区的“庇护人”责任，都构成了非市场交换的社会资本积累。这种“道德货币”虽无即时经济回报，却在长期中转化为社会信任与情感安全。正如西蒙·哈里特（Simon Harriet）所言，奥斯丁“关于玛丽安的经济叙事，最终折射到她和布兰顿上校的婚姻生活上，显示了作者坚持平衡原则下的道德优先和报偿理想”（Harriet, 1998, p. 117）。

然而，这一“道德经济学”的局限同样明显。小说的幸福结局成就了埃莉诺“完全像是个当家庭主妇”、玛丽安像个“女庇护人”角色，这都将女性主体性完全纳入了家庭经济的再生产。这一结局“精彩地演绎了资本、市场与情感、伦理之间的斗争、沟通和协商的历程”，但其“现代性”承诺最终被“传统的性别分工所收编”（Fan, 2021, p. 91）。奥斯丁的道德诗学因而处于批判与妥协的张力中：既暴露经济决定论的伦理危机，又承认其结构性不可逃避性。

《理智与情感》建构了一种批判性的经济人文主义。这一立场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承认经济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威洛比的“盘算”、露西的“精明”、以及约翰夫妇的“消费主义”都是对这一理性的不同形态呈现。其次，它坚持道德判断的相对自主性。埃莉诺的“隐忍”、达什伍德太太的“反经济”伦理、以及布兰登上校的“长期投资”都体现了伦理对经济计算的调节功能。最后，它关注这一调节的历史局限性。玛丽安的“情感教育”、露西的“道德模糊性”、以及结局的“性别收编”都显示了“道德经济学”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边界。

奥斯丁在小说中建构的这种批判性立场，与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形成复杂的互文关系。斯密的思想体系本身即内含着《国富论》中“经济人”的自利追求与《道德情操论》中“社会人”的同情心之间的张力。他试图通过“公正的旁观者”这一核心概念来调和两者，即个体通过想象他人的评判来审视并调节自身行为的合宜性，从而使自利行为不逾越社会伦理的边界（Smith, 2002, pp. 109–113）。本文所提出的奥斯丁的“道德经济学”，正是对斯密这一理论张力的文学性检验与深化。小说中的双重道德机制——“节俭的伦理学”与“情感的货币化”——可以被视为斯密哲学中两种人性逻辑在摄政时期特定社会情境下的戏剧化呈现。埃莉诺的审慎，正是“公正的旁观者”在女性经济依附困境下的内化实践，其“道德经济学”策略是将经济计算置于同情与责任的伦理框架之内。相反，威洛比与露西等角色则代表了被抽离了道德维度的“经济人”，他们的“理性选择”因缺乏“公正的旁观者”的调节而沦为纯粹的功利算计，最终导致自我与他人的情感破产。

因此，奥斯丁并非简单地图解斯密的理论，而是通过具体的、尤其是性别化的生活叙事，对斯密试图弥合的经济自利与道德同情之间的裂隙进行了深刻的文学勘探。她揭示了在现实的财产与婚姻市场中，“公正的旁观者”的调节机制是何其脆弱，而维系它的“道德经济学”实践又是何其艰难（cf. Butler, 2007, p. 112）。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试图调和“自利”与“同情”，将“公正的旁观者”作为社会秩序的调节机制（Smith, 2002, pp. 109–113）。奥斯丁的文学实践则可被视为这一理论的性别化检验：在女性被排除于正式经济领域的条件下，“同情”如何成为生存策略，“公正的旁观者”如何内化为自我监管，以及这一监管如何导致主体性的分裂与重组。汤普森的观察由此获得新的维度：奥斯丁“使经济关系变得可见”，不仅作为“社会分析的核心范畴”，更作为“性别化的道德剧场”（Thompson, 1988, p. 12）。

### 结语：经济叙事作为道德方法

《理智与情感》中的经济叙事与道德主题存在深层勾连关系。奥斯丁通过“饥荒价格”的历史语境嵌入、财产继承法的制度性分析、以及女性经济依附性的多重再现，建构了一套独特的“道德经济学”。这一体系的核心张力在于：“节俭的伦理学”与“情感的货币化”构成经济-道德连续体的两极，而其间的辩证转化揭示了摄政时期英国社会的核心焦虑。

《理智与情感》的持久价值在于其“不可穷尽性” (Derrida, 1976, p. 158)。19 世纪的批评聚焦“理智”与“情感”的性格类型学；20 世纪的女性主义解读关注性别与阶级的交叉压迫；21 世纪的“新经济批评”则揭示其政治经济学的文学形态。这些阐释的累积效应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共同指向奥斯丁作为“经济叙事家”的历史地位，她既是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敏锐观察者，亦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文学性回应者，更是对人类处境中经济-伦理张力的永恒探索者。

在当代语境中，《理智与情感》的经济叙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当“人力资本”话语将情感关系全面纳入市场计算，当“平台经济”使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日益模糊，奥斯丁的“道德经济学”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理性的伦理代价，以及在经济约束条件下维护主体性的可能路径。这一批判性的经济人文主义，既承认经济决定论的结构性力量，又坚持道德判断的调节功能，或将成为奥斯丁对 21 世纪读者最持久的馈赠。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Zhang Xin<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7-7814-9162>

### References

- 简·奥斯汀 (2010): 《理智与情感》，吴承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1811 年)
- [Austen, J. (2010). *Sense and Sensibility*, trans. Wu Chengy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1)]
- Austen-Leigh, W., & Austen-Leigh, R. A. (Eds.) (1913). *Jane Austen: Her Life and Letters, a Family Record* (2nd ed.). Smith, Elder & Co.
- Burnett, J. (1969). *A History of the Cost of Living*. Penguin Books.
- Burke, E. (2003).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Kessinger Publishing.
- Butler, M. (2007).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in the Drawing-room: Austen's Dialogue with Adam Smith." In E. J. Copeland, & J. McMast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pp. 108-125). Cambridge UP.
- Copeland, E. (1995). *Women Writing about Money: Women's Fiction in England, 1790-1820*. Cambridge UP.
- Copeland, E. J. (2006). *Introduction*. In J.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xvi-xxii). Cambridge UP.

-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C. Spivak. Johns Hopkins 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7)
- Easton, F.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nsfield Park*: Fanny Price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Textual Practice* (2): 459-496. DOI: <https://doi.org/10.1080/09502369808582322>.
- 范一亭 (2021): "城-乡系统论视域下的资本、生态与性别——论《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的‘现代社会想象’", 《国外文学》(3): 82-92+158。
- [Fan, Y. T. (2021). "Capital, Ecology, and Ge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 rural System Theory: On Austen's 'Modern Social Imagination'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Foreign Literatures* (3): 85-95. DOI: 10.16345/j.cnki.cn11-1562/i.2021.03.009]
- Gagnier, R. (2000). *The Insatiability of Human Wants: Economics and Aesthetics in Market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gory, J. (1996). "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In J. Todd (Ed.),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pp. 45-78). Pickering & Chatto.
- Harriet, S. (1998). *Jane Austen's Art of Ideological Narr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黄梅 (2010): "《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 《外国文学评论》(1): 175-192。
- [Huang, M. (2010). "The 'Battle of Ideas'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175-192.]
- Johnson, C. L. (1983). "The Twilight of Probability: Uncertainty and Hope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Philological Quarterly* (2): 171-186.
- Marx, K. (197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9)
- Nottingham, I. (2014). "Earnings, Money and Wealth in Jane Austen's Time." *Jane Austen—Her Life and Works* 11(May): 98-115.
- Rich, I. (1998). *The Economy of Thriftiness and Literary Narration*. Holmes & Meier.
- Shell, M. (1978). *The Economy of Literature*. Johns Hopkins UP.
- Sleath, N. (1988). *The Conduct Mode and Women Novelists' Consciousness*. Folio Press.
- Smith, A. (2002).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K. Haakonssen. Cambridge 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59)
- 苏耕欣 (2017): 《英国小说与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妥协与包装》。北京大学出版社。
- [Su, G. X. (2017). *The English Novel and Romanticism: Conflict, Compromise, and Packaging of Ideology*. Peking UP.]
- Thompson, J. (1988). *Between Self and World: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Woodmansee, M., & Osteen, M. (Eds.). (2005).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Wollstonecraft, M. (1992).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 M. Brody. Pengui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2)
- Wordsworth, D. (2002). *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 1798-1803 & 1797-1798*. Oxford UP.